

# 大兴土木建博物馆，这事得管

## 玉渊杂谭

杨雪

江苏盐城的中国海盐博物馆是2008年底才建成开放的，却因沉降、设备老化、屋顶漏水等原因，已闭馆谢客一年半之久。造价过亿的新场馆怎么区区几年内就“破败”了？为什么不按照博物馆惯例分区修缮和开放？到底维修什么，一年多了还修不出个所以然？令人费解。

当然，这还不算最过分的。上网一

查发现，2010年落成的银川海洋博物馆，刚开业几天就出现漏水、地砖松动、鱼儿生病，更在几个月后发生惊魂事故——海底隧道玻璃爆裂，逾百吨海水夹杂着各种鱼类、玻璃冲出，一条鲨鱼撞伤后缺氧而死……

如果说中国海盐博物馆还可以语焉不详地遮掩，那么银川海洋博物馆已然被事实扯掉了遮羞布。总之，“馆”有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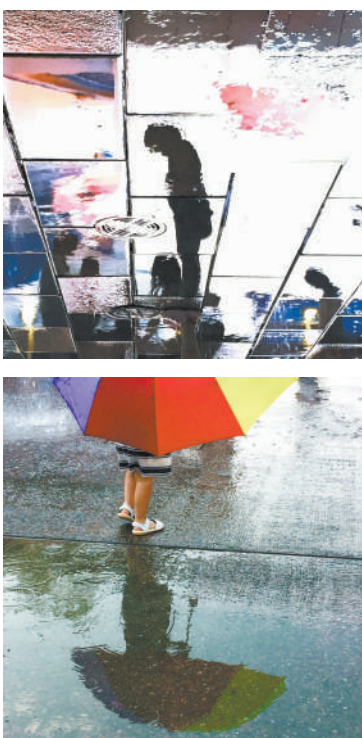
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中国博物馆事业“欣欣向荣”。走访大小城市，无论老博物馆建新馆还是新建博物馆，看起来建造气派的

各种场馆就雨后春笋。差不多在上述两家场馆建成的时代，2011年底，中国博物馆总数达到3589座，几乎每两三天就有一座新的博物馆诞生，这在世界博物馆发展史上堪称奇迹。

而所谓“奇迹”背后，多少离不开立项圈地搞建设的利益驱动。场馆建设质量问题已见端倪，但比基础设施偷工减料更可恶的是，偌大的场馆里常常没有什么像样的展品。博物馆众多，参观者却斩获甚微，这就谈不上是博物馆的野蛮生长，也逃不了虚假繁荣的嫌疑吧。反倒是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办的博物馆，并没有专门的建

筑，设施也朴实，但馆藏着实丰富。有时候，逛这种规模不大的博物馆，要用好几个小时。

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附近有家很出名的扇子博物馆，藏在一栋红砖外墙的小二楼，紧凑空间里收藏了几千件世界上最精美的扇子、扇叶等。民宅外观也超出了很多人对“馆”的认识。作为一家博物馆，只要有足够的条件保护好藏品，其实场馆的高楼大小、展陈是空旷还是紧凑根本不重要。当然，馆藏增多需要扩大规模的另说。反正，建博物馆就大兴土木，这事得有人管了。



## 摄手作

### 默

(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)

本报记者 孙韵孜 摄

# 高冷不是数学的错

## 字里行间

张盖伦



作者:[法]阿兰·巴迪欧  
译者:蓝江  
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  
出版时间:2017年5月

刚听到书名《数学颂》时，我内心是拒绝的。

“数学”有什么好“颂”的？尽管已不碰数学多年，但我仍能轻易想起被数学支配的恐惧。

作为一名偏科“伪学霸”，一到数学考试我就“秒怂”。后来甚至发展到对数学有了心理障碍：一到数学考试，我就紧张得双手双脚都很不得地方放；接过试卷要先祈祷，再战战兢兢地翻阅后面的“大题”——会做，啊，放心了；不会做，完蛋，我就沉浸在“又要考砸”的悲怆里。

数学这门课，和文科其他科目大不一样了——会做就是会做；不会做，那就是不会做。你没办法东扯西拉把试卷填满；你没有思路，就只能给阅卷老师一片尴尬的空白。

但法国哲学家巴迪欧提醒我们，这也正是数学的可爱之处。

还记得解出数学题的感觉吗？

我从记忆深处搜寻，搜寻那些已经被时光浸泡得很寡淡的情绪。对，好像确实是兴奋的。如果画出一条让一切迎刃而解的辅助线，或者想出一中“惊为天”的另类解法，我的脑中都要奔腾过一排排“我是天才”的弹幕，感觉原力与我同在。

巴迪欧说，这就是数学带给人的幸福。数学它纯粹、明确，不与事物状态和杂意见妥协，不会遮遮掩掩或含糊其辞，没有双重意义，不容欺瞒和瞎糊弄。在数学中，你能感受的快乐直接是普适性的——你知道你所感受到的东西，如果有人按照同样的推理和理解来进行

运算，他也可以感觉到这种幸福。这是一种“理智的幸福”。

巴迪欧的家庭很有趣。父亲是巴黎高师的数学系毕业生，母亲是巴黎高师的文学专业毕业生，而他自己，在巴黎高师念哲学。是的，这是一位在数学的理性与文学的感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哲学大师，他提出了“数学=本体论”，将数学提到了哲学范式的高度。可惜的是，我对哲学了解实在寥寥，对这一部分不敢妄加评论。

其实，《数学颂》相比巴迪欧的其他哲学著作，已经平易近人了一个数量级。他认为，数学病了。数学如今被局限于精英主义的圈子，大多数数学家认为，他们是唯一能理解数学的人。虽然有那么多学生埋头苦读，准备着数学考试，但数学已经沦为一种选拔精英的工具。“绝大多数人，一旦在学校里通过了一系列相对容易的考试，他们就根本不想再与数学有任何瓜葛。”不得不承认，看到这句话，我简直要大喊一声：“是我本人没错了！”

数学变得不可爱又高冷，但这并不是数学本身的错。巴迪欧说，数学是有趣的，它和艺术和电影一样，应当作为我们日常文化的一部分。

那么，到底错在哪了呢？“数学在专业教学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不是它应该起的作用。孩子们天生就喜欢解谜，他们完全能通过解题的方式，进入到数学构筑的游戏世界。”所以，“有趣”是数学的本色。只是，数学现在被当成了一种方法，一种知识，它的“有趣”，被遮蔽起来了。

另外，巴迪欧还认为，应该用活泼的、栩栩如生的方式来表述数学史，并以哲学为武器，探讨数学是什么。他建议，应该在学前教育的最初一年，同时讲授哲学和数学；5岁的孩子肯定能很好地应用无限的形而上学和集合论。

合上书，我开始回想。

其实，从小学一年级接触数字，到大学一年级作别最后一门带有数学字眼的“大学数学”，我似乎从未正眼看过数学。它永远都和考试挂钩。数学是“主科”，初中120分，高中150分，大学有4个学分，这似乎就是它的全部价值。我在它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，甚至还费了那么多感情，为它担心忐忑悲伤失落。然而，这些“重视”，也无非是因为我把数学当成了实现目标的手段。我把它看成通向幸福的阻碍，跟它对立，与它抗争，想把它踩在脚下，以为考到高分就是学习数学的完美结局。

但，我真的从未想过，数学到底是什么；也从未好好体会，数学带来的“理智的幸福”。

这已经成了一种遗憾，如今看来，也难以弥补。

# 圣菲研究所中的科学艺术大碰撞

## 科林碎玉

武中山

7月27日，美国剧作家、演员、导演山姆·夏普德因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并发症在家中逝世，享年73岁。他一生写过44部戏，获得过普利策奖；参演过很多电影，还因参演《太空英雄》而获得1984年奥斯卡最佳配角奖提名。8月4日，复杂性研究重镇美国圣菲研究所所长戴维·克拉克尔撰文，对这位文艺界名人表示怀念。要知道，戴维的主要研究兴趣是生物和文化中的信息处理机制进化史，他并非文艺界人士。他们是如何产生交集的呢？

原来，山姆·夏普德曾于2010—2011年间，在圣菲研究所做过访问学者。

2010年，美国投资家比尔·米勒在圣菲研究所设立了“米勒学者计划”，邀请各领域的专家来做访问学者，促进思想碰

撞和创意交流。选择资助对象时，他只看其创意是否卓越，不管你处于什么领域，什么学科，不管你是诗人还是画家。他特别喜欢资助标新立异者、圈外人和与现行规范格格不入的人。

戴维第一次打电话邀请山姆来做“米勒学者”时，山姆提出的问题出人意料：你们有没有大办公桌？我要放一部打字机。戴维说，没问题。几个月后，山姆来到圣菲，他和戴维聊起最喜欢哪种笔和本子。戴维说，他喜欢粗杆钢笔。山姆说，钢笔可能漏水，他更偏好圆珠笔和铅笔。山姆兜里总揣着笔，一有什么想法就赶紧记下来。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——山姆喜欢用的打字机和笔都是“落后”的，但他的想法是新的。

山姆能来圣菲研究所做访问学者，要部分归功于他的多年挚友小说家科马克·麦卡锡。他们都是唯美主义者。科马克对科学与数学有深厚的兴趣，从哲学上说，他简直就是科学家；而山姆则对于表

达科学观念的诗歌更感兴趣。他们还有一些共同点：都对美国景观有深挚的爱，都对地球有地学上的亲近感，都对大自然有深刻的敬畏。

山姆、科马克、戴维和他的妻子、以及他在复杂性研究领域的助手蒂姆·泰勒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几位文学大家，比如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、克努特·汉姆生、赫尔曼·梅尔维尔、塞缪尔·贝克特，议论其优点和眼界。山姆钟爱智利小说家、诗人罗贝托·波拉尼奥，科马克则说，波拉尼奥离我们太近，我们无法对其作品进行公正的分析。科马克和山姆趣味比较相近，两人都是梅尔维尔和贝克特的拥趸者。由于他俩都是爱尔兰人后裔，所以两人对爱尔兰文化和爱尔兰文学激情有强烈认同。

在担任访问学者期间，山姆对圣菲研究所开展的关于语言之历史、结构和潜力的研究逐渐发生了兴趣。他和戴维曾分享波兰作家、画家和文学批评家布鲁诺·舒尔茨著作中的一些精彩段落，例如，“一

桩事件在起源处也许很小，微不足道，可是，如果将其拉近，它在其中中心处也许能为我们打开一个无限的、放射的视角，因为一个更高阶的存在物正试图通过它来表达自己，使它光芒万丈”。戴维说：我们在科学上所做的不就是这个嘛，这个视角促进着科学家和艺术家相互交流，完成共同的事业。

戴维记得，与山姆的最后一次谈话是围绕丹麦导演卡尔·德雷尔执导、1928年问世的法国无声电影《圣女贞德受难记》展开的。山姆被无声电影的表现力迷住了，因为观众能长时间凝视银幕上某人的脸庞，这副表情可能是原始性的、敏感的、无懈可击的。

戴维说，他和很多人看着山姆时，也觉得他的表情是原始性的、敏感的、无懈可击的。

笔者感慨，如果在我国也能有更多这样的跨界交流，一定会触发更离奇的创新思路，带来更丰硕的创新成果。

# 从屏风管窥《红楼梦》的物质世界

## 品筑春秋

玄子



世界中。

《红楼梦》有两个世界，它现实的部分如此逼真，犹如一幅描绘古人生活空间、陈设艺术的生动画卷，而这些写实的边角，又或多或少参与到故事和叙事之中，成为虚实两个世界的过度。屏风就是书中一个有隐喻作用的侧影。《红楼梦》中有三十几处提到屏风。其中有插屏、绣屏、炕屏等多种形制，既有置于厅堂，也有置于闺阁，甚至是在没有描述它的空间里，屏风依然是“在场的”。它是主人权力地位、审美品位、生活方式的象征。

贾府的穿堂里放着一座大理石插屏。第三回林黛玉初到贾府的时候，“进了垂花门，两边是抄手游廊，当中是穿堂，当地放着一架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。转过插屏，小小的三间厅，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”。在穿堂中摆放屏风，是古代陈设中常见的形式，以示内外之别，让前院和后院既相连又隔离。黛玉转过插屏，也象征她进入了贾府更为私密的领地。石头插屏本是文房雅玩中常见的摆设，置于厅堂者少有，此处赫然一架，也显出贾府品位不俗，而使用紫檀架子，又是一人高的巨幅大理石，则是对贾家富贵的隐笔。

不同材质、不同工艺的屏风是象征主人富贵与奢华、尊崇与地位的符号，待客时，送礼时常需以珍奇的屏风来显示身份。玻璃在当时是舶来品，因此比较贵重。贾珍曾让贾蓉央求凤姐来借一扇玻璃炕屏，“明日请一个要紧的客，借了略摆一摆就送过来”。更为繁复奢侈的是缂丝围屏。第七十一回贾母八十寿辰，单挑选贺礼中的围屏来问凤姐。在凤姐看来，各家贺礼所送的十六件围屏中，“粤海将军那家一架玻璃的还罢了，江南甄家一架大理石十二扇，大红缎子缂丝‘满床笏’，一面是泥金‘百寿图’的，是头等的”。缂丝是一种极费工料的工艺，历来有“一寸缂丝一寸金”的说法，宋以后一直用于皇家御用织物，织造帝后服饰、摹缂名人书画等。已经足够华贵的玻璃屏风，被比它更为繁复奢侈的缂丝围屏比了下去。因此贾母问过后又嘱咐凤姐：“这两架别动，好生摆着，我要送人的。”

透过材质、图案等等，私密空间中的屏风更有表达主人审美取向和性格特质的作用。第四十回，贾母觉得宝钗的蘅芜苑过于朴素，吩咐丫鬟“把那石头盆景儿和那架纱桌屏，还有个墨烟冻石鼎，这三样摆在这

案上就够了”。贾母选的三件器物中两件有“石”，不啻宝钗内敛文雅的气质。纱桌屏是摆放在桌子上小屏，选择“纱”质，朴素之外多一点柔美，为宝钗的房间添些女儿气息。

屏风不仅在古人日常生活中时时“在场”，宴会游戏中也少不了它的身影。《红楼梦》第七十五回中秋之夜，贾母与宝玉及众姐妹在大观园中赏月，“于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，又用一架大围屏隔作两间”。贾母命人折一枝桂花来，命一媳妇在屏后击鼓传花。第二十二回，贾府众人猜灯谜时还出现了一种叫作围屏的小物。贾母“命速作一架小巧精致围屏来，设于当屋，命他姊妹各自暗暗的作了（灯谜），写出来粘于屏上”。围屏屏，是将扇形的屏风围成灯的形状，灯谜可以贴在屏风之上，或许是一种专门用于猜灯谜的玩物。姐妹们在屏风周围赏月、游戏，屏风俨然成为闺阁世界的塑造者。

屏风看似只是日常生活、社交待客、宴会游戏中可有可无的陈设，却在“用”与“无用”之间保持着微妙张力，成为反映古代士族审美趣味和性格特质的符号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趣味，正是这样一个鲜活世界的物质缩影。

# 牵牛寻常亦可亲

## 物种笔记

阿蒙



牵牛是极普通的花。八月暑气逐渐开始消散的时候，含露的清晨，这种淡紫、淡蓝的喇叭花朵便开始攀爬盛开。牵牛的习见，以至于人们并无把它当作精心呵护的植物。大约有很小一块可供生长的土壤，丢几粒种子下去，不花些时日，圆的或者是三裂的叶子就可以搭出一道小凉棚。花也会随之爬上藤架，虽一朝开来，不到半午便落了，却日日见花，越来越多。牵牛不似瓜藤厚重，果实累累的重量殃及支撑，细小光圆的小果实及纤藤细叶，就算爬得厚重了，也有几分轻盈，秋风吹得枯黄，收拾起萧瑟的藤架也干净利落。

和很多家养花不同，牵牛的名字与花的本性似乎没有多少关联。《本草纲目》引陶弘景的开并不遥远，相当于中国的明代中期。美洲的事物也是那个时候才传过来的。《本草》中引用南朝陶弘景的叙述便有些不实：“牵牛作藤生花，状如扁豆，黄色。”黄色的花，这样的“牵牛”大概是和它同科的鱼黄草一类的植物。于是有人以牵牛花的记载可追溯到南朝以降就有点站不住脚了。

《本草》后引宋代苏颂的记载，大体的描述已经和我们现在常见的牵牛有几分相似，尤其是“花似鼓子花而大”，指明它的花朵形状和大小。鼓子花是如今不算太常见的旋花科植物旋花，它的花真的与牵牛相仿。然而在记载中有些特点难契合，那就花色碧，藤蔓截断有浓汁流出。想必这样的植物也和牵牛有差别。李时珍的描述也是这两点相异，但是越发明显是牵牛花，而且如今可以入药做“牵牛子”的正是牵牛花的种子。

不知何时起，朝颜花这个名字在年轻人中传开，种植各色园艺牵牛花的小风潮也开始兴起。在以往的文献里，很少有提及“朝颜”这个词。《诗经》里倒有“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”，其中的舜华便指朝颜，不过这个朝颜所指的是木槿花。日本的《源氏物语》里也有类似的讲法，

其中有“朝颜”一女，又谓之“懂姬”。“朝颜花”做为牵牛的名号是从日本流行开的，因为日本把朝开暮落的粉紫色花大都统称为朝颜花，“朝颜的面容”，这种直译表达的确是适合形容牵牛之美的表述。

蓝色的牵牛有独特的魅力。日本人很喜欢这种外来的植物，它一传入日本，各方朝颜花便纷纷让位，从此朝颜便独指牵牛花了。常见的栽培牵牛花，有花色蓝紫的，叶片时三裂，时而又团圆带尖；也有花色粉紫的，这是习见的大花牵牛，花朵硕大，叶片也比较长，盛花时节藤架宛如紫瀑。日本人对牵牛花的育种也非常着迷，有《朝颜三十六花撰》，描绘日本园艺育种中那些奇形怪状的牵牛花。

相对日本，中国人对牵牛花的感情，显得以实用为重。牵牛花抵达中国后，用途是作为药用植物，取代了《本草纲目》以前用于药用的打碗花属植物，进而被广泛栽培。牵牛花的适应能力很强，原本人工栽培的植物，很快便逃逸到了野外，成了野生植物，于是这样美丽的花在人们眼里也成了常见的风景。和牵牛近缘的圆叶牵牛，适应能力比牵牛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在清代随美洲欧洲的航船到中国，却并非特意被引进的观赏或者药用植物，而是夹杂在货物中的杂草。这杂草一发不可收拾，如今的圆叶牵牛，除了极端地域之外，全国都有生长。

牵牛的种子也是常见中药，药名黑丑或是白丑，李时珍说这个名字是“时人隐之”，于是又不知道是犯了谁的忌讳。牵牛子很容易发芽，这也是它荒野无生的优势之处。不过，它的种子发芽需要较高温度，野生环境下四五月份发芽，大抵到七月初开始，藤上的花便零星开放。等秋风起的时候，草木皆结果，牵牛却越开越盛。花开花落间，果实也成熟抛洒种子，就这样蓝紫明艳到万木凋零的深秋，依然可以撑着花。面对这样的花，人们给了俗名“勤娘子”，虽算不上什么嘉奖，倒是念它的动人之处。